

# 安德烈·高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溯源

巩在峰<sup>1,2</sup>, 吴 宁<sup>3</sup>

(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哲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3; 2. 凯里学院 贵州 凯里 556000;

3.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3)

**摘要:** 安德烈·高兹融合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形成了自己的思想。高兹思想的发展经历了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有内在联系。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为了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

**关键词:** 高兹; 生态学; 马克思主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 B0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4)05-0027-06

## Origin of the Theory of André Gorz's Ecological Marxism

GONG Zaifeng<sup>1,2</sup>, WU Ning<sup>3</sup>

(1. School of Philosophy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Hubei 430073;

2. Kaili University Kaili ,Guizhou 556000; 3. School of Marxism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Hubei 430073 ,China)

**Abstract:** André Gorz integrated existentialism ,psychoanalysis ,Marxism and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ré Gorz's thinking experienced two stages: existentialist Marxism and ecological Marxism ,which are intrinsically linked. Coordin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s for human's liberation and its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Key words:** Gorz; ecology; Marxism; ecological Marxism

安德烈·高兹(André Gorz)广泛地吸收了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诸多理论,《叛逆者》一书是高兹详细考察他与自身、与周围环境、与社会整体之间关系的历史的代表作。其思想的发展经历了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这两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阶段。高兹在这两个阶段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不同、视角有重大转移。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侧重个性问题、人的非理性和个体性,远离现实生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关注全球问题、人类整体的解放、人与自然的协调,在现实问题的应对方面更加有力。但这两个阶段之间渗透着或明或暗的精神联系,具有内在精神上的契合性甚至一致性。高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具有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底色和基调,高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以人为本”上是一致的,差异只在于由关注个人的解放转向关注人类整体的解放,这是高兹理论思想的内在逻辑的发展和现实社会变化的结果。梳理高兹由存在主义

收稿日期:2014-02-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日常生活批判与中国民生问题”(编号:08CZX009);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项目“安德烈·高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编号:10JHQ046)

作者简介:现在峰(1966-),男,山东莒南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生,凯里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

吴宁(1966-),女,安徽桐城人,哲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与脉络,有助于理解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立、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有助于理解马克思主义不是一般的人类中心主义意义上的人本主义,而是生态主义意义上的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也不是狭隘的自然中心主义意义上的反人类中心主义,而是人本主义意义上的生态主义;有助于正确分析和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生态状况与社会危机,坚持以人为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和谐社会。

## 一、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强调从意识的意向性出发探讨个体的存在和自由,萨特和高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都是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理论主题都是个体的解放与存在主义在“以人为本”上是一致的。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最终为高兹提供了诠释自身和世界的手段,逐步给高兹灌输人类能获得自我解放和自我决定的持久信念。高兹接触萨特的《恶心》和《墙》之后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开始放弃自我否定,走向自我协调。“他发现当一个人无力于生活或生活对他来说没有意义的时候,他总是为自己寻求这样一种出路:去书写生命的无意义,去寻找一个解释、一个逃避,去证明所有的道路都被堵住了,除了——这种证明自身——之外。”<sup>[1] (P35)</sup>高兹在写作中净化一切问题并抽象地解决它们。在《道德的基础》中,高兹借用萨特的术语来建构和阐释自己的理论思想,在萨特对存在所做的两种区分(自在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的基础上把存在分为三种类型:自在的存在,自在-自为的存在,自在-自为-自在分别与过去、现在和未来相对应,“存在有一个从生命价值向道德—实践价值不断上升和转化的过程,这也就是人成为人,实现人的存在和自由的过程”。<sup>[2] (P121)</sup>高兹的《道德的基础》是萨特的《存在与虚无》的续篇,它对萨特的观点进行了必要的改造和运用,对萨特提出但并没有解决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把萨特的理论实践化、现实化,初步修正了萨特的虚无主义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脱节。高兹的准自传《叛逆者》就是一个存在主义者的自我反思,高兹在《叛逆者》中批判地运用萨特的术语:自在的存在、自为的存在、价值、原初谋划、恶的信仰等,剖析了自己的生存状态,认为“人是受到环境的制约,但是又不是完全被动的,同时也在改变着环境,能够基于环境而又超越环境,人的存在是环境与自己共同作用的结果,人的意向性是‘原初谋划’的体现,人在作为外在的环境的异化的受害者的同时,也是这种异化的一个同谋,这种异化也是自我异化”。<sup>[1] (P157)</sup>高兹坚持孩童的最初选择是由他们的初始条件的框架决定的,声称选择的持久程度大多取决于个人。论证人的主观知觉取决于选择的先在因素,在某种意义上与存在主义现象学相一致。高兹认为童年是异化的原初状态,对异化的体验是每个人对自由的经历受到社会的否定,因此对异化的经历是自由的前提条件,在萨特意义上我们是“注定自由的”。“恶的信仰”在萨特那里,是一种对人的存在的自由的否定,表示客观环境对人的制约性,而人就是要克服这样一种否定。“恶的信仰”是高兹理论分析和建构的工具,对高兹进行自我剖析及理论的系统化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高兹在《社会主义与改革》和《改良和革命》中倡导的党的组织形式是以萨特的融合集团为理想原型的,认为政党的最好的组织形式是由革命者组成的融合集团;高兹在《劳工战略》中对消费被社会的分析直接建立在萨特关于“匮乏”的观点上进行阐述,只是高兹所揭示的这种“匮乏”已经不是萨特所说的绝对匮乏,而是一种人为制造的相对匮乏,制造这种匮乏的目的是为了控制人的消费进而控制人。高兹以存在主义的匮乏论为依据,解释了生产和消费的异化。高兹认为,人是生活在一个以匮乏为主要特征的外部世界之中,匮乏的存在和再生产是资本主义重新创造异化的根源。基于这种匮乏,资本主义通过把需要神秘化和把人的活动物化而使其统治永久化。高兹认为资本主义的匮乏既有被人为制造出来的部分,也有客观必然的绝对匮乏的成分。特权产品、不平等是由人为的社会机制造成的,是相对的人为制造的匮乏,是可以克服的。在人为制造的匮乏之外确实也存在着绝对的匮乏。自然资源是绝对有限的,很多资源是短期内不可再生的,自然总体上对于人类而言不是“友好”的。这种绝对的匮乏就意味着,“即使零增长,对稀缺资源的持续消耗也会不可避免地最终完全把它们耗尽”。高兹认为这就是生态现实,即经济增长的生态学界限。<sup>[3] (P13)</sup>高兹认为,现在所存在的匮乏不能被视为一种能力的匮乏或学习能力的缺失,这种匮乏主要是教育体制的阶级特征的结果,使受过较少教育的父母的孩子难以得

到知识技能,并把好的学校成绩与社会特权和社会地位相等同。在匮乏支配人的时候,向社会主义的质的飞跃是不可能的。高兹的《叛逆者》和《告别工人阶级》是萨特的“前进-追溯”方法和“融合集团”观点在新的条件下的借用。高兹的《道德的基础》和《叛逆者》是建立在自己的人生体悟以及对萨特的术语的借鉴和运用基础上的:从理论主题看,高兹和萨特一样都关注个体和人类的解放问题;从研究方法看,高兹运用萨特的“前进-追溯”方法在《叛逆者》一书中回顾自己的过往、展望自己的未来,借用萨特的“谋划”概念来论证存在的超越性。总体来说,在理论主题、方法和术语上,萨特的存在主义是高兹思想的直接来源。高兹从列斐伏尔那里借用发展而来“前进-追溯”的方法(the regressive-progressive method),认为这种方法通过“追溯”的研究而揭示自己的历史、通过“前进”的研究而揭示主体的谋划。这种方法实际上也是由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融合而成的,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思主义分别对应于“追溯的”研究和“前进的”研究。

## 二、精神分析学

精神分析即探求人类心理深层的精神现象。弗洛伊德于1885年就开始早期或童年创伤经历和情绪病的研究,由此创建了精神分析理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包括了超我、自我、本我三个层次。“本我”也就是原始的自己,对应潜意识、无意识,不被个体所觉察,包括人的基本欲望、冲动和生命力。“本我”不理睬社会道德、外在的行为规范,追求快乐、避免痛苦,是人类个体与生俱来、先天存在的各种本能和欲望的综合,遵循“快乐原则”。“自我”是自己意识到的思考、感觉、判断和记忆,对应下意识,遵循“现实原则”。“超我”是自我的高级存在,对应意识,是通过内化道德规范、内化社会及文化环境的价值观念而形成的,主要是监督、批判及管束自己的行为,遵循“道德原则”。超我与本我都是非现实的,包含很多无意识。本我的无意识来自力比多,超我则来自于社会,也就是“他者”。要求自我按照社会认可的方式满足本我,是一种理想化、道德化的自我。弗洛伊德指出,自我是超我与本我的一个“中间人”,要使本我、自我、超我三者协调起来,就需要靠自我调节超我与本我的关系。

高兹早期哲学思想中存在的精神分析学主要体现在《叛逆者》一书中对自己与环境的分析。高兹从历史唯物主义和精神分析两个角度分析“原初谋划”。高兹在把精神分析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补充上与萨特一致,认为家庭在一个人的童年成长中对其内在心理结构和存在方式有重要影响,对于个人以后的生活有重要作用。借助于精神分析法,可以对被马克思主义所忽略的个人的童年状况进行研究。高兹强调精神分析存在的必要性,认为“个体的主体的苦难不是在社会和经济世界中异化的结果,……而首先是、尤其是来自一个‘原初的情结’(infantile complex)、来自反过来反对它自己的不幸的选择”。<sup>[1](P54)</sup>高兹认为“精神分析的目的应该是消除那些阻碍对异化的意识和阻碍在总体行动中人的总体的实现的精神上的障碍和存在的选择情结”。<sup>[1](P58)</sup>精神分析必须导向对改变世界、改变人的环境的自由的必然性的理解,同时还必须导向对各个领域和层面上的个体的实现自由和创造一个人类世界的可能性。高兹强调“即使在后革命社会中,人仍然是作为儿童出生的,仍然是通过一个原初的选择与世界发生关系,并且为了实现自我,必须解释这种选择。因此精神分析仍然有它的特权”。<sup>[1](P57)</sup>高兹认为“如果没有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求——人应该是其所是,并且这造就了人——作为指导,没有一个有效的精神分析,也就不可能有道德的转型”。<sup>[1](P58)</sup>“这样的要求对于存在主义的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来说是一样的,必须确立对个体的理解和存在主义的转型。”<sup>[1](P58)</sup>

## 三、马克思主义

高兹和列斐伏尔都讨论过工人自我管理的问题。<sup>[4](P19)</sup>高兹和列斐伏尔都是在1968年五月风暴的影响下最终完成向日常生活批判的转向。在对资本主义的日常生活危机、生态危机、消费社会及其异化的批判中,高兹和列斐伏尔的立场有相近之处。高兹与列斐伏尔一样在日常生活的层面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进而研究资本主义的危机并分析危机的原因。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高兹影响较大,《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大

纲》、《神圣家族》也对高兹产生了影响。马克思指出,“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才能得到实现和表现……人对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对他人的关系,才能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sup>[5] (P43)</sup>现实的人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人,并通过生产、生活等实践活动与自身、与他人、与自然发生各式各样的联系。马克思批判异化,阐发了自己对克服异化和奴役以实现人类自由、解放的理论诉求。人的解放成了高兹一生的追求和理论旨归,贯穿了高兹一生思想的发展轨迹,奠定了高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基础。高兹坚持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观点,把个人主义上升到集体主义,在“现有”中寻求“能有”,主张通过与现实的压迫和异化的斗争来实现社会主义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高兹与马克思的基本立场、理念和价值观是一致的。马克思认为,人同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人与其他人的关系才能得到实现和表现,“自我”的三个层次(作为身体的自我、作为意识的自我和作为社会关系的自我)贯穿着“他者”意识,“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sup>[6] (P8)</sup>马克思关于社会变革和无产阶级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的观点直接影响了高兹,高兹也汲取了马克思在政党问题上的观点,认为无产阶级革命需要一个政党作为组织核心来指导和发挥作用。高兹的确是一个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马克思的批判者。

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哲学、生态经济学和生态社会主义构成了高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人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既需要自身内在潜能的激发,又离不开社会环境的支持,自我决定和平等的社会关系就成了自我实现的必要保障。作为个体的自我实现和人类的未来进化都呼唤非等级制的社会,这种社会将能够确保人们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都是非等级制的。高兹力主扩大个体的自治与自由,强调民主与社会公平对于环境问题解决的重要性。高兹早先是个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当真正深入到生态问题的时候才发现:把非人化的自然逐出理论研究之外、在一个封闭的社会形态内根本无法实现人的自由解放问题。人的解放包含着自然的解放,自然的解放包括解放属人的自然(人的本性)和解放外部的自然界,使自然真正摆脱为了特殊社会集团的利益而导致的破坏性滥用,使人类按照美的规律和尺度而非破坏性地利用自然,从而实现人和自然的内在统一。高兹倡导一种关系性的自我,提出“自我就是他者”的关键命题。“他者”不仅包括其他人、其他文化、其他民族,而且包括女性与自然。高兹认识到实现所有人的自由是实现个人自由的必要条件,宇宙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坚持在人对人的关系上要视他者为自我,抹平自我与他者的界线,将自我无限扩大,将他者包容其中。高兹将自我与自然同一化,将自我与他者合并为一或认为他者是自我的延续,将自然看成是自我的一个维度,将“小我”扩展成包括整个生态系统的“大我”。通过扩大自我的认同范围,让自己的生存和他人的生存、自我的存在和自然物的存在之间建立了某种有意义的联系,自我与他者之间存在的鸿沟被填平了,自我与他者的对立被超越了。高兹提出的关系性自我范式有着深厚的生态文明底蕴,也有着相对于以往自我范式的超越性,对扭转目前的生态危机和人类危机、实现人类和地球的可持续性存在与繁荣具有重要的意义。

#### 四、法兰克福学派

高兹批判资本主义的技术异化与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的观点比较接近。20世纪70年代之后,世界范围内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法兰克福学派开始从生态学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进行批判。在对科学技术的反思中,把科学技术与生态环境直接联系起来,指出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是人类生态危机的根源。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中,对启蒙精神和技术理性与工业文明进行了反思、批判,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异化与人类自身的解放问题联系起来,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处于异化的状态中,只有实现自然的解放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解放。法兰克福学派的虚假需求理论、“生活世界殖民化”理论、工具理性批判理论及“科技意识形态”理论对安德烈·高兹有直接的影响。

##### (一) 高兹与法兰克福学派的“虚假需求”理论

在马尔库塞看来,追求物质享受并不是人的重要需求,物质需求的满足并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幸福。现代西方社会的人把物质需求作为最重要的需求,统治者为了促进社会消费把“虚假需求”强加于个人,不断地刺激人们购买商品的消费欲望。“如果大众传播工具和谐地而且经常不引人注意地把艺术、政治、宗教和哲学同广告节目混成一体,它们就使得这些文化领域成为它们的公分母——商品形

式。”<sup>[7] (P49)</sup> 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大众传媒已经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统治者通过大众传媒竭尽所能地激发人们的消费欲望,操控人们的价值取向,强加给人们“虚假需求”。“真实需要”是出自人的本性的自主的需要,与“虚假需求”是相对立的,而“发达工业社会最显著的特征是它有效地窒息了那些要求自由的需要”。<sup>[7] (P8)</sup> 马尔库塞区分人的真实需求与虚假需求,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处于异化状态。在马尔库塞的“虚假需求”理论基础上,高兹进一步指出发达工业社会的矛盾已经由生产领域转到消费领域,造成了消费异化。消费制造出无穷的需求,使大众得到虚假的满足,在比较中获得优胜。在“虚假需求”的社会里,消费成为商家刺激和满足人的“虚假需求”的手段,“成功不再是一种个人评价,也不是生活品质问题,而是主要看所挣的钱和所积累的财富的多少”。<sup>[8] (P113)</sup> 人已经意识不到自己真正的需求,把幸福寄托在商品消费上,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生产和出卖自己并非绝对需要的东西上,如化妆品、保健品、电玩、私人小汽车、带私人游泳池的豪宅等。人变成商品的附属物,把自己的幸福等同于商品的消费和对财富的占有。高兹把生产和消费结合起来作为考察生态危机的切入点,认为过度生产和消费延缓了经济危机但造成了生态危机。“资本主义企业管理首先关注的并不是实现生产与自然相平衡、生产与人的生活相协调,确保产品仅仅服务于公众自己选择的目标,使劳动变得更加愉快;而是花最小的成本生产最大限度的交换价值。”<sup>[3] (P5)</sup> 人的消费欲望的畸形膨胀必然导致对自然的过度消费,加剧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

## (二) 高兹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生活世界殖民化”和工具理性批判理论

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概念直接影响了高兹。哈贝马斯把“生活世界”的概念看作是“交往行为”概念必不可少的补充,提出“体系-生活世界”的双层构架分析西方社会理性化的过程。社会现代化包括生活世界合理化和体系合理化。生活世界合理化表现为内部结构要素不断分化,主体的沟通行为呈现出越来越大的独立性,随着合理化程度的提高,人们沟通上的误解越来越深。体系的合理化表现为社会内某些结构和运作机制的变革是非理性的,以目的理性或工具理性作为运作的准则和目标。由于经济和政治对生活世界的侵蚀,造成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人们的交往受制于国家的权力和制度系统。哈贝马斯认为,“已经建立起来的增长机制造成世界范围内人口和生产的增加。经济增长,就要求人口增多,要求更多地开发和掠夺自然,这样就遇到两个物质限制:一是不可再生资源,如可开发和居住的土地资源、淡水资源、食品,此外还有不可再生的能源、矿物、燃料等;二是不可替代的生态系统,生态系统主要是消化污染物,如放射性废料、二氧化碳、废热等……人口和生产的急剧增长,即对外部自然进行控制的扩张,总有一天会达到生态环境所能承受的极限”。<sup>[9] (P59-60)</sup> 高兹认为“经济理性作为一种工具理性的特殊存在形式,不仅仅扩展到了与其无任何关系的社会制度当中去,而且也使整个社会丧失了原有的同一性,以及也使得个人得以存在的社会关系也不存在了,也即整个社会的生活世界已经被殖民化”。<sup>[10] (P32-33)</sup> “我想指出经济理性和‘认识-工具理性’的共同根源,他们的根源就在于思维的一种形式化,把思维编入技术的程序,使思维孤立于任何反思性的自我考察的可能性,孤立于活生生体验的确定性。种种关系的技术化、异化和货币化在这样一种思维的技术中有其文化的锚地,这种思维的运作是在没有主体的参与下进行的,这种思维由于没有主体的参与就无法说明自己。欲知这种严酷的殖民化是如何组织自己的,请看:他的严酷的、功能性的、核算化的和形式化的关系,使活生生的个人面对这个物化的世界成了陌路人,而这一异化的世界只不过是他们的产品,与其威力无比的技术发明相伴的则是生活艺术、交往和自发性的衰落。”<sup>[11] (P600-601)</sup> 高兹具体分析了在经济理性统治下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认为经济理性使活生生的主体面对这个物化的世界成了陌路人。

## (三) 高兹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科技意识形态”理论

高兹还受到法兰克福学派“科技意识形态”理论的影响。霍克海默首先提出科学技术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观念,指出“不仅形而上学,而且还有它所批评的科学,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后者之所以也复如是,是因为它保留着一种阻碍它发现社会危机真正原因的形式”。<sup>[12] (P5)</sup> 阿多诺、霍克海默合著的《启蒙辩证法》虽然没有系统阐述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但他们对启蒙精神和工具理性的批判实质上是对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功能的批判。马尔库塞进一步认为贯穿在科学技术活动中的技术合理性本身包含着一种支配的合理性,即统治的合理性。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生活福利很大程度地提

高了,但是人们却满足于物质享受,丧失了反抗精神,同现存制度一体化,失去了精神自由。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认为,技术的进步不但没有使人得到解放反而创造了社会控制的更有效形式,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技术不再是单纯的工具现象而成为了改变人们生活的政治现象。科学技术的进步被统治阶级用来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控制,人们已经拜倒在商品面前,失去了对社会的鉴别能力和反抗能力。象征人类文明的技术一方面成为解放人的工具,另一方面又成为新的统治和压抑人的工具。随着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开发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也日益脱离与自然的天然联系,成了迷失方向的存在。随着劳动的分工越来越细,人们在劳动中只是在从事一些单调无聊的工作,人们不能在自己创造的世界里认识自己。高兹认为科学技术的合理性导致了政治的合理性,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的成果,使自己的活动更加符合科学的追求,科学技术成了维护现存秩序、操纵大众意识的工具。在《反革命与造反》中,马尔库塞不仅将生态危机看作是由科技进步所引起的危机,而且看作是一种政治危机、制度危机,得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是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直接结果。马尔库塞认为资本主义对科学技术的滥用是造成资本主义社会“单向度”的主要原因,工具理性已经渗透到政治意识形态。马尔库塞从科学技术的角度来解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思路直接为高兹所采用。

哈贝马斯明确提出“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的概念,真正体系化了科学技术执行意识形态职能的理论,指出“科学技术今天具有双重功能,它们不仅是生产力,而且也是意识形态”。<sup>[13]</sup> (P482) 他认为只有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当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时,才履行意识形态的职能。由于国家对经济生活干预加强,统治者将政治问题转化为技术问题,将实际问题“非政治化”。科学技术充当意识形态,起到了“非政治化”的意识形态作用。高兹受法兰克福学派科技意识形态理论的影响,认为科学技术具有强大的生产能力但也具有破坏性,科学技术的发展实现了人的解放的同时导致了人的异化,科学技术越发展,人受到的压抑越大。资本主义的技术只要存在,即使改变生产关系,也不能解决工人受压抑的情况,科学技术是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重要因素。高兹提出了技术法西斯主义理论,分析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社会作用的异化问题,探讨了“技术官僚主义”与“技术法西斯主义”的关系,指出“技术法西斯主义”是与资本主义国家权力和独裁体制相结合的。高兹立足经济基础告别工人阶级与法兰克福学派激烈批判资本主义大众文化消磨掉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可以互作阐释。在许多方面,高兹的《告别工人阶级》被认为过分悲观地对待个体丧失自由的能力,被认为是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的翻版。

#### 参考文献:

- [1] André Gorz. *The Traitor* [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Press, 1989.
- [2] André Gorz. *Fondements Pour Une Morale* [M]. mars, 1977.
- [3] André Gorz. *Ecology as Politics* [M].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0.
- [4] H. Lefebvré. *Elements for a Sociology of Self-Management* [M]. in B. Horvat et al. (eds), 1975.
- [5]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0.
-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7] (美) 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 [M]. 刘继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 [8] André Gorz. *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 [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89.
- [9] (德) 哈贝马斯. 合法化危机 [M]. 刘北成, 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 [10] André Gorz. *Socialism Ecology* [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Press, 1994.
- [11] 俞吾金, 陈学明. 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下)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 [12] (德) 霍克海默. 批判理论 [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5.
- [13] 刘放桐. 新编现代西方哲学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0.

(责任编辑: 郭荣华)